

追问母爱：主题学视域下《饥饿的女儿》 与《宠儿》的母女冲突研究



陈安妍, 彭石玉*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 在传统中西方家庭矛盾中, 母女冲突相较于父子冲突往往易被忽略和轻视。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打破传统女性无声或失语的状态, 突出女性声音, 还原女性真实。《饥饿的女儿》和《宠儿》都是女性作家对女性真实自我的表达, 二者围绕相似的主题“追问母爱”, 呈现了中西方母女在面临冲突时的不同选择。本文以比较文学主题学为理论视角, 从两部作品的共同母题母女冲突分析作品中叙事结构与表现方式、家庭背景与伦理环境以及文化表达与价值意义三个方面, 旨在探寻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写作的差异性和目的。

关键词: 《饥饿的女儿》; 《宠儿》; 母女冲突; 主题学

DOI: [10.57237/j.ha.2025.02.001](https://doi.org/10.57237/j.ha.2025.02.001)

In Pursuit of Maternal Love: Mother-Daughter Conflict in *Daughter of the River* and *Beloved* from a Thematic Perspective

Chen Anyan, Peng Shi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family conflicts, mother-daughter conflicts are often ignored and trivialized compared to father-son conflicts. However, the advent of wom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has marked a significant paradigm shift, challenging the longstanding silence or aphasia surrounding women's voices. Through literary expression, contemporary female authors have sought to reclaim and foreground women's lived experiences, offering a nuanced portrayal of their realities. Notably, works such as *Daughter of the River* and *Beloved* as testaments to this literary renaissance, with both texts serving as powerful vehicles for female self-expression. Centered on the universal yet culturally specific theme of "in pursuit of maternal love," these narratives delve into the intricate dynamics of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revealing the divergent paths taken by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navigating familial conflicts across cultural divide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matic,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mon motif of mother-daughter conflict in the two works, analyzes the three aspect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expression, family background and eth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value significance. By elucidating the disparities and underlying motivations driving women's writing across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al landscapes, this study aims to

基金项目: 武汉工程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资助 (No. CX2024194).

*通信作者: 彭石玉, pengshiyu@wit.edu.cn

收稿日期: 2025-04-24; 接受日期: 2025-06-18; 在线出版日期: 2025-07-19

<http://www.humarts.net>

contribute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female identity and agen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Keywords: *Daughter of the River; Beloved; Mother-Daughter Conflict; Thematic Perspective*

1 引言

《饥饿的女儿》和《宠儿》是中美当代女性主义女性成长题材的作品，前者是女儿在寻找身世中自我的成长，后者是母亲由奴隶到自由人的成长，基于母爱的母女冲突构成了两部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文学体系中的表现，也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时代的演变[11]。近年来，对两部作品中的母女关系主题的研究不足，如杨姗姗从女性谱系的视角分析《宠儿》中的母女关系[9]；张芸以《宠儿》为案例，认为社会和文化对非裔母女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5]；徐红和罗漫关注女儿寻找母亲形象的心路历程[8]。因此，本文从《饥饿的女儿》和《宠儿》中的叙事结构与表现方式、家庭背景与伦理环境以及文化表达与价值意义为逻辑，揭示中西方不同的表达方式、伦理，文化和历史，对中西方的母女冲突进行比较分析。

2 叙事结构与表现方式

在情节上，虹影和莫里森采用了相似的叙事结构。作品中的母女冲突都遵循产生—激化—消解的演变过程，且母女冲突的来源都是女儿的诞生，冲突激化的原因都是“父亲角色长期消失又突然出现”，矛盾消解都代表着女性成长，只是在《饥饿的女儿》中成长的角色是女儿，《宠儿》中成长的是母亲。

六六出生于1962年重庆三年大饥荒的末年，在家里已有五个孩子的艰苦环境下，她的降生无疑是负担，此外，她尚未出生就有两项“罪行”伴随她。一是母亲将三姨夫饿死之罪加在她身上，因为她本可以“顶住一切压力，让又病又饿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2]”，但为了六六她畏缩了。二是母亲的私通之罪在她身上延续，她是母亲不合时宜的爱情的牺牲品。六六的出生带来了母女矛盾，但无辜的六六并不知情，只能同样怨恨对自己满口脏话且脾气怪异的母亲，她甚至“当面背后都不愿意叫她一声妈妈”，母女二人“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2]。随着六六长大，她“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

的人”，但当她问起母亲自己出生的那段时期，母亲总是“有意冷漠”[2]，而她也发现在她上学路上有一个中年男性经常跟踪她，于是六六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世。在她十八岁生日这天，母亲终于告诉她她的私生女身份的真相，并与其生父小孙约定在当天安排父女首次相见，此刻母女冲突彻底爆发，在六六看来，生父本该抚养她，却十八年一面未见，生母本该关爱她，却未尽其责，她纠缠于男人的情爱，导致了家庭混乱错乱，也导致了她的屈辱存在。六六不承认生父，让母亲又气又无奈：“六六，你恨他，我以为你只恨我呢”[2]。但在六六离家出走后，她又想起自己三岁时，母亲选中文殊菩萨作为她的守护神：“或许她早就清楚，我一生会受的最大的苦，就是‘想知道’，母亲可能比任何一人都了解我，她是真为我担心”[2]。而当她离家多年后回家时，母亲“话很不中听”，但对于六六归来，她“又惊又喜”[2]。离家出走对六六来说，是逃避，也是成长。她学会了独立生活，不再因“饥饿”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小说结尾时，六六听到生父熟悉的口琴声，用在母亲子宫里的感受来形容，暗示了女儿与父母和解的结局，母女冲突最终消解。

宠儿出生于1855年美国奴隶制时期，母亲塞丝是一位从“甜蜜之家”种植园逃出来的黑奴，住在辛辛那提124号。在奴隶主赶来抓捕她时，她割掉两个月大“刚会爬了”的女儿的喉管杀死了她，以逃避女儿成为奴隶的悲惨命运。宠儿还没来得及感受母爱就被母亲亲手扼杀，化成鬼魂笼罩在124号中，使其恶意充斥，怨气冲天，母女冲突无可避免地产生。“甜蜜之家”中的另一位男性奴隶保罗D找到124号，与塞丝结合，想填补家庭中缺失的父亲角色，当他带着塞丝和女儿丹芙去狂欢节游玩，仿佛是真的一家三口时，宠儿按耐不住了，她化成人形，住在124号，时时刻刻索取塞丝的爱。但这对塞丝来说是一种负担，宠儿像一个无底洞急剧地消耗她，并想赶走保罗D，此刻母女冲突激化。塞丝一边经受宠儿对她的索取，一边在是否要留保罗D住下的选择中犹豫不定，她的脱变展现于一张

简报的出现,上面写着塞丝逃跑弑婴的记录。保罗·D起初不肯相信,但塞丝却引以为豪,“再一次在心里掂量那个奇迹的大小,它的味道”[5],因为她把宠儿和她的孩子们带到了“能获得安全的地方”[5],即使是死亡。保罗·D不能理解她过浓的母爱,选择离开,而塞丝只是平静地与他道别,并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离不开他,因为“只要我(塞丝)愿意,世界上没有谁我不能爱”,“总而言之,那就是自由”[5]。塞丝成长为独立的自由人时,宠儿离奇地消失了,母女冲突也随之化解。

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相似,但在表现方式上有明显的东西方差异。第一是表达母爱的方式。两位母亲与女儿产生矛盾都是基于浓烈的母爱,但六六的母亲表达母爱时以“恨”代爱,符合大部分中国母亲很少向子女直接表达爱的习惯,一是受“棍棒底下出孝子”和“严师出高徒”等中国俗语影响,认为子女不应娇惯和溺爱,二是中国父母较西方更加传统和保守,常常羞于直白地表达情感。而在西方,母亲往往希望让女儿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母爱。宠儿向塞丝索取母爱时,塞丝毫无保留地顺从她,哪怕宠儿让她不堪重负,她也全盘接受。中西方母爱表达表现出中西方在表达方式上委婉和直接的差异。第二是对于冲突场景的描写方式。中国作品倾向于写实,冲突场景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而西方描述冲突多侧重宗教意象和恐怖元素,比如房屋闹鬼,鬼魂还魂成人形等,且冲突的场景往往血腥而暴力。这也符合中国抵制宗教迷信和暴力行为,而西方的宗教更加包容和多元,且枪支合法的文化 and 法治背景。

3 家庭背景与伦理环境

除了叙事结构,两部作品还有相似的家庭背景——父亲角色缺失,而母亲角色占主导,这也是前文提到的母女冲突激化的原因之一。在母女冲突中,父亲的影响并不是隐身的,父亲角色的缺席很多时候不仅意味着母女两人物质生活的匮乏,而且极易引发母女两人心理层面的病变[4]。

在《饥饿的女儿》中,六六的生父小孙的消失导致了她在精神上的“饥饿”。六六的养父虽然和她没有激烈冲突,但也不算亲近,以至于“表露情感,对我(六六)来说是难事,也没有什么人在乎我的情绪反应。我的家人,会觉得我想说的一切纯属无聊。至今唯一耐心听我说的人,是历史老师”[2]。由于父爱的缺席,“恋爱情结”还常常表现在成长女性选择一个年龄比自己

大很多的成年男性,作为自己的爱恋对象,满足于假想父爱对女性自我的肯定[1]。在历史老师送她回家时,对父爱的渴望让六六对历史老师产生了畸形的情感:

“我正被自己内心的欲望折磨着,盼望他握住我的手,把我抱在怀中,亲吻我。”

母亲从未在我的脸上亲吻,父亲也没有,家里姐姐哥哥也没有这种举动。如果我在梦中被人亲吻,我总会惊叫起来,我一定是太渴望这种身体语言的安抚了[2]。”

正如生理饥饿来自精神饥饿,性欲望也来自爱欲望。爱欲望不仅是寻求情感的完满或弥补童年与少年的家庭缺憾,也是求知、求同、求理想的实现[10]。六六在最后也明白,她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是她“生命中缺失的父亲”[2],一个年龄大到足以安慰她,睿智到能启示她,又亲密得能与她平等交流情感的父亲角色。

小孙的缺席也意味着六六母亲精神上的折磨和隐忍。在母亲带伤找活干但被欺辱时,是小孙找来止痛膏,帮她料理家务和孩子,还让她在他所在的塑料厂里做工。对六六母亲来说,小孙“就像老天爷派来的”[2],支撑了她,救了她们全家。但二人的相爱和结合却有悖道德,母亲深知自己犯下的错,所以把全部的苦痛都独自一人承担:“她不爱父亲,却为父亲做从未为我生父(小孙)做的一切,她的孤独,她的心事,只能向佛诉说,她没有一个听众”[2]。父亲的缺失在六六母女的冲突中是主要的一环。

在《宠儿》中,124号的塞丝一家同样面临父亲角色缺失的情形。父亲角色长久地消失却突然出现,引发了塞丝和两个女儿的冲突。首先是大女儿丹芙。塞丝的丈夫黑尔目睹塞丝被凌辱后消失,因此丹芙自出生起就没有见过父亲。所以当保罗·D初次来访,她看见自己的母亲“装成小姑娘,而不是丹芙一直熟识的那个安静的、王后般的女人”时[5],她意识到保罗·D即将成为家中缺失的父亲角色,于是下意识排斥他,盼望宠儿的鬼魂大闹一场把他赶走。在饭桌上,她故意对保罗·D无礼,致使她和母亲第一次发生了冲突:

“塞丝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火炉边,可还没抓住丹芙的衣领,那姑娘就向前挣去,哭了起来。”

“你怎么了?我从没见过你这么不懂事”[5]。

但狂欢节之行让丹芙“很高兴开始觉得保罗·D或许不算太坏”,且“沉醉在喜悦中”[5],说明丹芙内心也是渴望父亲的,对保罗·D有着复杂的情感。比起丹芙,宠儿的反应更为强烈。她还是鬼魂形态时,用神秘力量引起整栋房子的地震,使保罗·D在颠簸中破口大骂;

在保罗 D 带着塞丝母女像一家三口般出游时，她化成人形在 124 号住下，企图占有塞丝所有的注意力，最后甚至诱奸了保罗 D，她用尽一切极端的手段使塞丝的爱只属于她一人，这种病态的母女关系也是母女冲突的隐射。

六六与宠儿的家庭背景相似，却反映出中西方不同的伦理环境。在中国，母女之间的冲突很常见，但最终结局都像六六母女一样和解，即使无法和解，也极少出现弑母或弑女的情况，而母女冲突叙事的原型弑母恋父情结的典型代表人物厄勒克特拉来源于西方，《宠儿》也是根据西方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原型是一个叫玛格丽特·加纳的黑人女奴从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在奴隶主追到她的住处时用斧头砍断了小女儿的喉管。中国深受传统伦理思想和孝道文化的影响，而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中西方母女在面临冲突时可能会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

4 文化表达与价值意义

两部作品都是围绕追问母爱的主题表达母女冲突叙事，但反映出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表达，集中表现为宗教上的差异性。中国对于不吉利的宗教意象往往持敬意，企图通过语言或行为化解，但在西方会出现漠视凶象、不敬神明的现象。

中国在表达宗教意象时都以“吉利”为目的，正如六六三岁时，母亲带她去庙里拜佛，将文殊菩萨当作她的守护神。即使出现不吉的现象，人们也会添一句解释强行化凶为吉，比如“打碎的碗”，以“碎碎（岁岁）平安”化解。对于六六是否应该出生，母亲和小孙到罗汉寺庙中求签，约定好抽到上签和中签都要，但却抽到了下签。对于不吉利的结果，“两人异口同声说，抽签不算，”因为“两个人抽的签，就不是佛意，佛归一心，归哪个人的心”[2]？虽然无法解释成吉象，但也要先破解凶象。四姐和德华的结婚时的被子里外颠倒，代表着不吉，“若应对一句，比如，‘被子不吉，人大利！或者说，‘风吹太阳晒，霉运就离开’，都行”，但“四姐和德华忘了老辈人的教训，没有说任何话，恐怕就是在这时，一团肉眼看不见的凶气投向了他们”[2]，此处不吉利的现象没有任何举动来破解，暗示了小说后文德华痛苦病逝。因此，中国在表现宗教文化时表现出尊敬的一面，且非常注重破凶这一行为。

反观《宠儿》，一开始就描写了宠儿怨毒的鬼魂缠绕在 124 号，“镜子一照就碎”、“蛋糕上出现两个小

手印”、“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着热气”等等[5]。宠儿通过神秘的宗教力量闹得 124 号不得安宁，塞丝母女却照常生活，对于宗教中代表诅咒、怨恨和恶意的元素，在西方是可以被接受的。此外，对于上帝的意象，西方会呈现出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一方面，塞丝视上帝为希望，在强大而又根深蒂固的制度前，她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的骨肉不受摧残、不受奴役，把孩子送到上帝那儿是唯一的选择[12]。另一方面，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曾虔诚信仰上帝，但她却经历了白人的残酷、媳妇的疯狂、孙女的惨死，面对这一切她无能为力，不得不放弃对上帝恩典的信念，那颗曾经火热的心也变得冷漠[6]，她的宗教幻想最终破灭。中国对不吉意象呈现出极端的排斥，同时对吉利的意象强烈推崇；而西方在面对不吉时更加冷漠，同时对于神明的力量并不完全拥护。

虹影和莫里森都试图通过母女冲突表现更宏大的价值意义。虹影以自传式文体、现实主义手法旨在表现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她所处理的文化图景、传统习俗、历史事件与心理现实繁杂而庞大，就明显标记的政治事件而言几乎完成了对一个世纪中国人精神罹受的纷乱和迷狂镜像的速写：黑社会、战争、建国、饥荒、贫困、文革、下岗、八十年代……[13]，虹影展现的是一个处于动荡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和饱含苦难的底层人民，传递的是冲突的化解，心灵的回归和个人的救赎。同时，《饥饿的女儿》也表现虹影面对苦难，不惧死亡固执坚强的生存意识。作为一个在苦难中成长的女性，从“食”的饥饿到“爱”的饥饿，但是她以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心存希望地勇敢面对并精彩生活[14]。而莫里森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以故事的形式传达了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莫里森在她《宠儿》所要表现的并不是奴隶制度，而是像玛格丽特那样的奴隶们的生活状态[7]。“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房梁到地板都塞满了黑鬼的悲伤”[5]，奴隶制对黑人而言是不可言说的痛苦，对白人而言是道德上的尴尬，所以患有“记忆缺失症”的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从社会历史的大层面上看，宠儿是整个美国白人社会的他者，她的存在提醒着白人铭记历史的真实，铭记黑奴制及其影响是美利坚民族史中不容回避的一部分[3]。莫里森重提历史，不是为了揭开一个种族伤疤，而是为了疗愈各个种族的创伤。

5 结语

《饥饿的女儿》和《宠儿》以母女矛盾的产生—激化—消解的结构为主线,发出了女儿追问母爱的不同声音,从中表现的是中西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不同的母爱表达方式、面临冲突时的伦理选择和宗教观念。母女冲突本只是小家庭中的小矛盾,但虹影和莫里森旨在以女性视角书写国家和种族,在男性和女性混合的声音里,她们的话语掷地有声。

参考文献

- [1] 高小弘. “恋父”与“审父”——论 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父亲文化形象 [J]. 绥化学院学报, 2008, (02): 55-58.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0438.2008.02.017>
- [2] 虹影. 饥饿的女儿 [M]. 四川: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
- [3] 黄宇洁. 作为他者的宠儿——评莫里森的小说《宠儿》[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06): 53-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9839.2006.06.008>
- [4] 李延佳. 传统潜结构的审美再生: 当代女性文学母女冲突的模式与构型 [J]. 当代文坛 2023, (02): 60-6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820.2023.02.008>
- [5] 托妮·莫里森. 宠儿 [M]. 潘岳, 雷格译,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 [6] 王敏. 从《宠儿》看托妮·莫里森的宗教救赎观 [J]. 黄山学院学报, 2014, (04): 54-5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447X.2014.04.012>
- [7] 王守仁, 吴新云. 性别 种族 文化: 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8] 徐红, 罗漫. 在饥饿中沿着“母亲”寻找母亲——《饥饿的女儿》母亲原型双重意象的探讨 [J]. 世界文学评论, 2007, (02): 55-59. <https://doi.org/CNKI:SUN:SJWP.0.2007-02-017>
- [9] 杨姗姗. 女性谱系视角下《宠儿》中塞丝的母女关系[J]. 梧州学院学报, 2020, (05): 82-8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535.2020.05.013>
- [10] 姚溪, 向天渊. 边缘人的声音:《饥饿的女儿》与《紫色》的女性身份构建 [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06): 188-195. <https://doi.org/10.11817/j.issn.1672-3104.2018.06.026>
- [11] 乐黛云.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12] 章汝雯. 托尼·莫里森《宠儿》中自由和母爱的主题 [J]. 外国文学, 2000, (03): 91-94.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00.03.015>
- [13] 张文显. 殊异的女性诗学——虹影《饥饿的女儿》的一种解读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S1): 47-49. <https://doi.org/CNKI:SUN:JSDX.0.2015-S1-014>
- [14] 张妍. 论虹影自传体小说的女性成长主题--以《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为例 [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08): 97-10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5310.2013.08.015>
- [15] 张芸. 莫里森的《宠儿》与非裔母女关系研究 [J]. 名作欣赏, 2016, (21): 131-135. <https://doi.org/CNKI:SUN:MZXS.0.2016-21-054>